

#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所提供的理论启示\*

陈学明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离不开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等,都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人的存在方式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2)12-0085-09

我国学术界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毫无疑问,这30多年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果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其意义主要在于促进了人们开拓眼界,解放思想,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僵化的理解;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其意义主要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境遇,重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那么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自本世纪初以来)以后,它的主要意义就表现在它成了我国开创新的发展模式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丰富、完善和扩展需要

吸收各种正确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实践告诉人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内容和若干思想流派能够为丰富、完善和扩展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某些理论启示。对此,我们在这里作一初步的论述。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使我们知道,在中国走上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能使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是可能的。

中国目前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着许多问题,而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目前所处的危机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危机。中国这些年向西方学习,努力西方化实际上也就是努力现代化。中国西方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所以,处于新的历史拐点上的中国所要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面对现代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研究”[11&ZD06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11JJD710001]和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2011RWXKZD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

处于新的历史拐点上的中国,似乎只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有些人开始主张中国停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化、现代化的历程。在有些人看来,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悬崖勒马呢?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而倒退无论如何是无奈之举。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很有可能中国人民现代化的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却已把中国拖垮了。

那么,处于历史拐点上的当今中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还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呢?这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一些启示。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当代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全盘否认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它努力地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它深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

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它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直接强调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反对把现代性视为不可救药,从而提出现代性的“救治”方案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批判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但不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可救药。他说,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sup>[1](p.37)</sup>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sup>[1](p.56)</sup>哈贝马斯认为,拯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由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sup>[2](p.525)</sup>他把交往理性概念作为理解现代性的普遍范畴。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人们真正了解了现代性出现危机的根源,即不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即发展交往理性。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其实现形式的。而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正是从这里他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哈贝马斯和一些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对现代化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而是把现代化运动中

的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要求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它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最负盛名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sup>[3](p.1)</sup>他还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的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sup>[3](p.2)</sup>高兹强调,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而业已确立的现代化的界限正被不断突破。发生危机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其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高兹认为,如果坚持当前的危机就是现代性的危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处于对过去的怀旧的伤感之中,而不能赋予那些引起我们过去的信仰崩溃的变革新的含义和方向,从而也就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现在关键的是要改变对现代化的观念,即那种把现代化视为是没有界限的、可以漫无边际地加以突破的旧观念。他说,“我希望证明现代化具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界限,证明这些界限只有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而正是这种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这里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给我们能加以现代化的领域划定界限”。<sup>[3](p.2)</sup>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确立在现代化过程中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可以做。

有比较才有鉴别,只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作一对照,其言之有理、鞭辟入里就会更清楚地呈现于前。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源自对现代性理念,特别是

对作为这种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体现的现代化运动的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问题在于,这是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所展开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念和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有四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无视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福音,而对之持全盘否定态度;二是不对现代化运动作历史的分析,看不到现代化的一些负面效应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三是把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本身带来的,是现代化运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四是强烈要求回到前现代化状态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能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早、更深刻地觉察到了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但他们在对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展开揭露和批判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所有这些特点在他们身上很少体现。他们在批判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又讴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使人类摆脱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他们肯定现代化运动是推动近200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他们仔细地剖析了现代化运动中各种负面效应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揭示现代化运动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现代性的理念带来的,而是由目前推进现代化运动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在他们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当人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一种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时,就有可能充分展现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并同时大大地消除其消极作用。

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我们绝不能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因为现代性对人类有积极意义,即使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也不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其次,我们也绝不能放弃对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的关注与消除。既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不是根源于现代性本身,



那么我们就应当对这些负面效应持无能为力的态度,而应当积极地寻找出现这些负面效应的真实原因,并且想方设法消除这些原因,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

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启示的选择在中国的大地上正逐步变成共识。中国将不会停止现代化的脚步,但将不把现代化与西方化混为一谈,当下的中国一定会走出一条并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新路来。而当中国一旦踏上这样一条新路,也就意味着中国再次顺利地越过了新的“历史拐点”。

##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

我们必须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2010年6月3日的《社会科学报》发表了赵修义《不要再回避生产关系了》的文章。赵修义在文中强调,在研究当今中国的问题时千万不能再“放弃生产关系的维度”。他还抱憾他在几年前就已撰文“提醒”“不要忘记生产关系的维度”,但“可惜应者寥寥”。在笔者看来,赵修义触及了问题的要害。研究当今中国的问题,离开了对生产关系的考察,那就是背本趋末,冬扇夏炉。

如果着眼于生产关系来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就要研讨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不能否认,市场经济有其消极面,同样不能否认,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是由市场经济的消极面所产生的:

第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可以在市场在进行交换的商品,劳动者成为单纯的劳动工具。一部《资本论》就是对劳动者成为商品的控拆与揭露。劳动者一旦成为商品,劳动者就成为与其他“物”一样的东西。当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出去以后,自己实际上已沦为附

属于人的工具,他的唯一属性就是像工具一样动作。

第二,市场经济推崇效率至上原则,进行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就是获取利润,使劳动过程成为纯粹谋取利润的过程,劳动者从属于GDP。市场经济必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效率至上,还要市场经济何用?市场经济一旦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就直接地围绕着为资本的增殖这一轴心旋转。资本的逻辑就是增殖,不顾一切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借助于市场法则。生产的组织者完全服从于获取利润的目的,显然就不会再考虑什么劳动者本身的自我实现。

第三,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到激烈竞争的风口浪尖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主要是竞争的关系,劳动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笼罩下生活。市场经济是一种认可个人利益、肯定竞争的经济,这种竞争也表现在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上。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惜与自己的伙伴展开竞争,不惜“以邻为壑”。我们平时总讲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不是文质彬彬的,可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可不是请客吃饭的,说的就是市场经济之下包括在劳动者之间竞争的无情。

第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以出让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与依靠占有资本的人相比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资本与劳动两者之间,市场经济是一种偏袒资本的经济。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利益与资本的拥有者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劳动者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中只分得一小杯羹,极大部分都流入了资本拥有者的口袋。

我们认为,以上四个方面的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我们敢不敢正视。著名的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曾经写过一本题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书,他在该书中详细地而又旗帜鲜明地论证了计划经济是一条把人们引向奴役的道路。前一段时期,上海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另类”发起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我们是不是走上了另一条奴役之路?与会者大多认为,按照目前

的市场经济模式搞下去,人类实际上走上了另一条奴役之路,而且受奴役的首先是广大劳动者。

在这里我们从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角度探讨了当今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是如何造成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主张废除市场经济模式,终止市场经济之路。这一结论不符合我们的本意。必须明确,我们这里所说的导致社会问题滋生的因素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正如中国经济转型的其他方面一样,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尽管也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但显然前者远远大于后者。我们不可能因为市场经济存在着这些负效应,而放弃整个市场经济模式。人类的复杂性就在于其目标是多元的,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人类往往有着多种目标追求,人类不可能为了一个目标而放弃甚至牺牲其他目标。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增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目标而放弃提高劳动者地位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为了实现提高劳动者的地位的目标而放弃迅速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国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多种目标之间保持张力。

现在迫切需要一种既能放大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又能限制其负面效应的理论,从而促使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地运行下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启示。

正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市场只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在中国掀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浪潮之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发出了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强烈呼声。英国工党智囊机构费边社的理论家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编著的《市场社会主义》一书给“市场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简洁明了,广为流传:“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sup>[4](p.1)</sup>尽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把市场与社会主义

结合在一起的声音,但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是力主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但只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推动下,这一讨论才成了一个热点。“市场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个聚焦点就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我国的研究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倒并不是在于“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强,而主要基于清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的需要,以及加深认识我国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必要性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首先,我国的研究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梳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是同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合而为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正确地梳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积累了许多思想资料。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从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理论来看,他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实行的是无市场的计划经济。所以,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是改变马克思把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进而认为社会主义无市场的观点。他们在这里的基本看法是把“市场”视为“中性机制”,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经济手段。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说,虽然马克思的市场理论从历史评判而不是从价值评判的角度对市场机制也有所肯定,甚至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机制的运行作出了详尽的考察,但总的来说马克思对市场机制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这一点已被时代所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果,是对马克思原有的市场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其次,我国的研究者又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的把握,与对当代中国为什

么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及如何走这一道路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是借助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同样也正是借助于这一研究,特别是借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重要理论成果的认识,日益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而且日益丰富和完善了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

关键是要明确,只有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消除目前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现象。

严重的两极分化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看到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在“安抚”那些处于两极分化一极的广大穷人。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言词中,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即是成功人士与失败者的区别,他们把富人称为“成功人士”,而把“穷人”称为“失败者”。在他们看来,穷人之所以穷,主要由于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了下来,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所以失败了。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将传统儒学与佛学的一些理论经过他们“折射”后变成了纯粹的“天命论”,他们正用这种“天命论”向我们广大的穷人说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你们“安贫乐道”、认命吧!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能容忍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样去“安抚”广大劳动人民吗?当然不能。我们应该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来面对这一问题。这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着眼于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人与自

然之间的矛盾,即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提供某些启示。

面对如此沉重的生态危机,人们没有熟视无睹,而是提出了各种方案力图从这种危机中走出来。问题在于,这些方案真的能帮助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吗?且看下述各种方案:

有的人力图通过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所谓“非物质化”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向环境倾倒废料的数量。将经济“非物质化”的途径就是通常所说的实施“低碳经济”。

有的人力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他们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只要技术改进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率,并且采用更良性的生产工艺,清除严重和最严重的污染物,那么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有的人企图通过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坚持认为,“生态退化是市场化不彻底所带来的”,必须“在市场中内化外部成本”,因此他们主张通过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

有的人力图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一些人正在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拯救地球、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

我们不否认上述所有这些力图消除生态危机的设想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哥本哈根世界峰会所发生的一切,还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的事实都无情地告诉我们,仅仅指望通过上述这些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徒劳的。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把上述所有这些途径和方法称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幻想”。他这样说道:“通过探讨全球变暖而得出的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反环境特征这一严酷的结论,与近年来有些人提出的资本主义不是威胁,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就有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方法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sup>[5](p.22)</sup>在他看来,离开了资本主义制度来寻找消除生态



危机的道路都是“幻想”。可以说,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真正能使自己从这种危机中走出来的思想武器。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近2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发展最快的一个派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学者最近一段时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集中于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的。研究者不仅深入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流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高兹、本·阿格、莱易斯等的理论,而且跟踪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新涌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福斯特、奥康纳、佩珀等的思想观点。综观这一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始终围绕着“马克思究竟有没有生态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富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仅包含着深刻、系统的生态理论,而且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我们的研究者及时地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成果应用于挖掘和领会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在我国国内是在近年才昭示于众的,有些研究者甚至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深刻的生态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即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这无疑得益于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切地说,得益于把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研究,集中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3部著作的研究,而我国的研究者也顺着他们的思路,主要从这3部著作中挖掘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以及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相互关系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关于人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的阐述。我国研究者在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着眼于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现实意义的阐述。在当今中国,从上到下对下述问题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人类究竟应当与自然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类理想社会中究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生态危机究竟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它会把人类引向何处?生态危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生态危机是人类追求现代文明的必然归宿还是可以消除的?当今人类究竟如何着手消除生态危机?在消除生态危机的综合工程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什么呢?这说明在当今中国,人们不但认识了生态危机的性质与危害性,而且也知道了如何摆脱生态危机、建设文明。这离不开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指引,在一定意义上也与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关。

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对立。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显然在当今中国消除对自然环境日益严重破坏的关键就在于限制资本逻辑。确实如他们所分析的那样,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生态问题都与资本无节制地追求利润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对资本逻辑的限制谈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就是专设一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理念、目标和制度加以论述,提出要从源头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改变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一贯强调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理论,能为我们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人自身内部身心之间的矛盾,即人的单向度的日益加剧提供某些启示。

对于当今人们正日益成为“单面人”,即只

是从满足自己的物质的贪欲这一维度来发展自己这一点,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非但不加以指正,而且还想方设法推波助澜,由此造成人的生存的意义是不是仅在物质领域就能全部实现,还是必须从各个方面满足自己,在追求全面满足中来实现自己的意义,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在这一事关人类究竟应当如何生存下去的关键时刻,显得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人们有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有根据的,由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围绕着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交往、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异化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人学”。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也情有独钟,在这方面所推出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研究往往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阐述的形式展开的,这就为我国的研究者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研究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有关人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研究者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关于马克思的人的理论的认识。可以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基础上,我们已经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占有突出的地位。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阐述,最有价值之处:一是揭示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的全面性,即揭示出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马克思总是把人理解成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二是与此相应揭示了马克思总是全面地、整体地论述人的异化,即揭示出马克思所看到的人的异化不是某一方面的异化而是整体的异化;三是由此出发进一步揭示了

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发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其全面性,即揭示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是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相互协调地得以发展。我国研究者把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马克思对人大量论述中凸现出来,给予充分的关注,显然是吸收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正当我国研究者聚精会神地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特别是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深入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之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了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沿着更正确的方向发展,针对我国的社会现实,发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号召。我国研究者又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研究、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研究,又与对“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合在一起。一些研究者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研究而进一步领会和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来认识“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意义。有些研究者强调,贯彻“以人为本”一方面要切实改变“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使我们的社会不是以商品、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另一方面必须把以人为中心进一步落实到以“整体的人”为中心,即不把注意力仅集中于人的某一需求上,而是满足人的整体的需求。对于“科学发展观”,有些研究者强调对其深远意义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使我们知道必须使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全面地、协调地、可持续发展,而应当更加深入到使我们明确我们必须全面、自由地发展自身,建立一种不是以“占有”为特征而是以“实现自身”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生存方式。

当今中国人民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认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强调自己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而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创对整个人类的意义越来越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



展进程,与此同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注重的是“特色”,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走入“民族狭隘性”,恰恰相反,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与超越,“民族特色”只是意味着一个民族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世界性影响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文明应对所面临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与危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能否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它能否为人类探索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如果这样去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就充分认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的重大意义。从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看到的“人的全面发展”、“幸福生活”、“美丽中国”、“共同富裕”等词汇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将在中国形成。

当今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开创中国发展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有没有意义,以及意义究竟有多大,就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否为开创中国模式提供某些理论启示。

开创中国特色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关键在于能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中国一方面继续推进现代化;另一方面又避免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所经常看到的那种“现代化之病”。我们上面所论述的第一个方面正是说明了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现代性批

判理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在充分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把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做到“鱼和熊掌得兼”。

开创中国特色实现现代化的模式,还必须正视和妥善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即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以及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我们上面所论述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方面则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破解这些难题,找到正确的解决道路。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我们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动力主要来自于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强烈的意义感。一旦我们能够认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开创中国发展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就会满怀使命意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研究中去,我们的研究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 [1]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2] J.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M]. Suhrkamp Verlag,1988.
- [3] 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 Brooklyn : Verso, 2011.
- [4] [英]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编.市场社会主义[M].邓正来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 [5] 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责任编辑:晓 凌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m through the macro-control on economic and social operations. The necessity of the state macro-control lie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post-war period, in the microeconomic level, is reflected i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ocial attribute of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All the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emergence of state macro-control, changes in capitalist ownership and the whole modifications in capitalism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capitalist ideology. (Xiao Qinfu)

**Marx's Thought of Ideology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After the Cold War, ideology was not only not end, but the struggle of the field became more intense. The ideological battlefield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America was especially fierce. But in the strong ideological offensive of western countries, some people have advocated weakening ideology. We must trace back to the origin of Marx's ideology on this false thought, which has important meaning for discriminating, responding and criticizing the contemporary thought of the end of ideology and adhering unswervingly to socialist ideology dominated by Marxis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ull completion of the goal of a well-off society. (SHEN Yu-mei)

**The Dimension of Aesthetics Practice—A Controversy between Marx's Thought of "Human Perceptual Activity" and New Practice Aesthetics:** Before Marx's practice existentialism, two biases had been dominating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aesthetics, either aesthetic interest was considered as the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r formal law, or the transcendental nature was sought after from aesthetic subject's concept. In fact, aesthetic interest is neither abstract senior human nature nor independent internal nature and its external expression. Marxist aesthetic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rich practice of aesthetics, evaded division between object and subject in the wester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this sense,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Marx's human perceptive activity becomes the key of the controversy in new practical aesthetics. To stress the dimension of practical existence of aesthetic interest means to stick to the openness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in reality and life superiority in aesthetic activity. (SU Bao-hua)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Marxism for China Today:**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absorption of all kinds of ideas and resources. Facts prove that Western Marxism ha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enlightening the opening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dern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m, market socialism, eco-socialist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so on, provide the inspiration for us in buil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EN Xue-m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World Culture Ma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report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new periodic task for cul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construction;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s the landmark of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Mo Yan, with hi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al experience, a successful response to the global culture experience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s path of thinking.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 in China need to continue to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need cultural workers to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reativity of the great contribution to make the world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O Han)